

茅于軾

无悔

的历程

茅于軾 岑科 李高阳 / 著

八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与历史进程紧密相连，
尽显一位工程师出身的经济学大家对平等自
由的不懈追求。他的思想、人格与行动，堪
称中国公民社会之典范。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茅于軾 无悔的历程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茅于軾:无悔的历程 / 茅于軾, 岑科, 李高阳著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0.10

(影响中国·经济学人)

ISBN 978-7-213-04373-4

I. ①茅… II. ①茅…②岑…③李… III. ①茅于軾-自传 IV. ①K825.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7575 号

书 名	茅于軾:无悔的历程		
作 者	茅于軾 岑 科 李高阳 著		
出版发行	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:(0571)85061682 85176516		
集团网址	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://www.zjcb.com		
责任编辑	周为军		
责任校对	张谷年		
封面设计	鞠 磊		
电脑制版	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		
印 刷	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		
开 本	710×1050毫米	1/16	
印 张	13		
字 数	21.8万		
插 页	4		
版 次	2010年10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		
书 号	ISBN 978-7-213-04373-4		
定 价	29.00元		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第一部 自 述 / 1

第一章 家 世 / 2

- 我的爸爸妈妈 / 2
- 童 年 / 4

第二章 成 长 / 8

- 抗战中的磨难 / 8
- 南开中学 / 12
- 大学教育和学问之道 / 15

第三章 立业成家 / 22

- 从事铁道事业 / 22
- 爱人赵燕玲 / 25

第四章 悲惨岁月 / 30

- 稀里糊涂成了“右派” / 30
- 下放山东几乎饿死 / 32
-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抄家 / 34
- 发配到大同机车厂 / 37

第五章 转向经济学研究 / 43

- 离开铁道研究院 / 43
- 改变我命运的人 / 44
- 开眼看世界 / 47
- 在澳大利亚教书 / 52
- 学术总结 / 55



茅于軾

无悔的历程

第六章 社会活动 / 60

- 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 / 60
- 扶贫与办学 / 61
- 渐入老境 / 63
- 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和展望 / 64

第二部 同道 / 69

第七章 学界往事 / 70

- 经济学探险 / 70
- “如兄之友,如父之师” / 73
- 怀念杨小凯 / 76
- 留美经济学会 / 81

第八章 播种观念 / 84

- 《择优分配原理》的背后 / 84
- 经济学传道士 / 86
- 站在风口浪尖 / 89

第九章 知易行难 / 94

- 天则在民间 / 94
- 一起为穷人办事 / 97
- 公民社会行动者 / 102

第十章 生活本色 / 106

- 和青年人在一起 / 106
- 陌生的朋友 / 110
- 平凡是真 / 113

第三部 立言 / 117

第十一章 经济原理 / 118

- 择优分配原理 / 118
- 附:茅于軾对择优分配原理的讲解 / 122
- 一般均衡与“金钱万能” / 124
- 价格万岁 / 127

- 交换创造价值 / 130

第十二章 财富本质 / 134

- 财富创造原理 / 134
- 富国与穷国的差别 / 136
- 投机的利弊 / 139
- 财富如何被消灭 / 142

第十三章 制度解析 / 146

- 平等——市场制度的基石 / 146
- 有特权即无人权 / 149
- 民主的核心是宽容 / 153
- 社会科学中的“牛顿定律” / 156

第十四章 道德思考 / 163

- 从经济的角度看道德 / 163
- 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不足 / 168
- 建立新的道德观 / 171
- 附:茅于軾对市场经济中
非自利因素的讲解 / 176
- 人生的意义 / 182

第十五章 未结束的争议 / 186

- 为富人说话,为穷人办事 / 186
- 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 / 189
- 建议取消经济适用房 / 192
- 赞同高校学费涨价 / 195
- 人民币升值的障碍何在 / 198

茅于軾

无悔的历程

第一部

自述

茅于軾 著



茅于軾

无悔的历程

第一章 家 世

当我回顾一生的经历时,大多数岁月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印象,只有一些零星片断倒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,这些片断既有决定我人生命运的大事情,也有无关紧要的小事。这确实是人类记忆之谜,它是如何选择信息,在大脑中长期地载录下来。但这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课题。

我曾说,希望再有机会活60年,以弥补过去被耽搁了的岁月。这说明了我对生活是满意的,是乐观的。虽然过去的岁月多半是挫折和沮丧,但改革开放之后形势已经逆转。而且即使在最悲惨的年代里,生活中仍旧有幸福的一面。

我的爸爸妈妈

我爸爸名叫茅以新,妈妈名叫陈景湘,都是1902年出生,爸爸比妈妈大6个月。爸爸活到1990年,妈妈活到1992年。妈妈生我们4个兄弟姐妹,我是老大,老二叫茅于杭,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,老三叫茅于兰(女)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(2008年因老年痴呆和忧郁症去世),老四叫茅于海,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名教授,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。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。

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,是中国的桥梁专家,是我的二伯父。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。大伯父叫茅以南,20世纪50年代初就因食道癌去世了。他早年留学日本,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。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,大房有8个,二房有7个,再加我们这房4个。这19个叔伯兄弟中出了3个右派,比例是远高于别的家属。这跟茅家的自由思想有关。我还有一位姑妈,叫茅以纯,她毕业于金陵女大,学钢琴。她很不幸,在1939年因伤寒去世,终年

36岁,她的丈夫叫戴般若,生了两个儿子。戴般若很有才,智商高而情商低,潦倒一生,于1969年2月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去世,终年68岁。

我的祖父叫茅乃登,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。曾著文《江浙联军光复南京》,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。他死得很早,只活了60多岁,我很小时候得知他去世,那时候我们在杭州。爸爸特地去南京奔丧。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。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,鼓励我写好字。每天要写一张大字,她在上面批圈,每批一个圈给我一个铜板。我今天对书法有兴趣,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,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。她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去世,终年70。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。虽然家境贫困,但是重视子女的教育。她的3个儿子都是留学生,女儿是大学毕业生。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。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,她大部分时间和茅以升住在一起,生活过得很舒坦。

我爸爸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,他原在唐山交大,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。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,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。最后走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。回到南京老家,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。本来应该很赚钱,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,公私业务繁忙,对修车的需求很强。但是国民党官僚倚仗权势,强买强卖,没有保护伞做不成生意。开的修车铺不但没赚上钱,反而被抓去坐牢。后来他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(浙赣铁路的前身)工作,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。那时候茅以升正在杭州修建钱塘江大桥。从那时起,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。他主持浙赣、粤汉、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,去日本购买机车,去美国引进“二战”的战后铁路物资。开办柳江机厂。他的工作作风是勤劳廉洁,一丝不苟,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,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。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,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,1950年广州解放后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,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(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)。这是他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。但是他得不到信任,有职无权。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满腔热情,但是不可能做成什么事。后来政治运动不断,更谈不上做事了。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,还当过政协委员,待遇按副部级享受。

我爸爸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参与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前铁路的机车车辆都是外国进口的,各个国家的都有。各国的标准不同,车辆就无法连接。比如车钩的高度不同,常常发生列车分离的事故。制动风管的连接十分困难,检修零件因为标准不同,不能统一备制。标准化的工



茅子轶

无悔的历程

作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,做了几十年。他在工作作风方面,廉洁奉公,宽以待人,严于律己,对人富有同情心。这些特点在茅家多多少少是普遍的,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。

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。陈章觉得我爸人不错,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。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。陈家也是苏州名门。我的外祖父陈希濂(聆诗)是光绪时的进士,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外祖父得进士的报喜照片。陈章教了一辈子书,新中国成立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,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做南工大教授。大舅舅陈霆锐学法律,也是美国留学生,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,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,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(相当于人大代表)。这就是我的母系状况。

我妈妈一生多病,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,维持全家的生活,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。她机智幽默,爱护子女。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,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十分融洽。我们刚结婚时,我妈每次出门访亲都要我爱人陪同。大概有点得意显比的意思,带一个极漂亮的儿媳,自己脸上有光。我妈晚年听力视力都出问题,近乎又聋又瞎,和外界的沟通非常困难,只有我爱人能够跟她沟通。我妈是无疾而终,最后死在医院里。当时我爱人给她梳头,忽然就不行了。

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,都有留学生的背景(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),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、平等、开放、崇信科学。我们家不拜祖宗,不看风水,不信教,但是也不反对别人信教。我们家里书特别多,其中文书也多。有一本 *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* 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书,我会唱其中的每一首歌。我看五线谱是自学的。后来学小提琴,更是离不开五线谱。我儿子也喜欢音乐,我的孙女儿茅尚彬能弹一手好钢琴,在学校比赛时经常得奖。

童年

我母亲家在苏州,嫁到我父亲家,那是在南京。起先和祖父母住在一起,那是一个大家庭,有大伯伯一家,当时二伯伯茅以升在杭州建钱塘江大桥。我妈吃不惯南京的伙食,正好我爸开汽车修理厂失败,杭州铁路又需要人,在我满月的时候就搬去了杭州,在杭州一住就是6年,我在杭州上了小学,但是只读了不到一年就因我爸工作的调动离开杭州。

在杭州时我们住在竹园棚,离街道不远的一座两层楼。上街要走大约10分钟,经过一段荒凉的野地。夏天时路上有许多蛇。竹园棚里有一个小池塘。有一次二弟茅于杭跌入池塘,我用一根竹竿救他把他拉起来。其实那个池塘并不深,大概淹不死人。

同在杭州的不光有茅以升一家,还有我姨妈。她的女儿王咏仙是著名的美人。那时候刚刚留学回国的金庆章(也是学机械的)拼命追王咏仙。为了追她,送了我不少东西,有小西装、玩具。最后他们终成眷属,是我爸爸、妈妈做的媒。抗战时金庆章坚守浙赣铁路,日本人到不了的地方一直保持运营通车,因此建立了功勋。战后当了浙赣铁路局的局长。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他是大地主出身,不断挨整,被调到唐山铁道学院教书,后来又调去兰州铁道学院。

最巧的是1966年我家被抄家时王咏仙为了躲避运动从兰州来北京,住在我家。她的东西一起被抄。后来经过交涉她的东西发回给她了。更巧的是兰州铁道学院的党委书记钱心,是我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。金庆章的反革命分子定性就是钱心给定的。后来钱心因患脑瘤,50多岁就死了。他是我们同班同学中死得最早的一个。整人的人死了,挨整的倒还活着。金庆章“文化大革命”后平反,补了一大笔钱,他活到90多岁。

在杭州我爸上班地方很远,在钱塘江的对岸,也就是萧山。每天上班先骑车到江边,再摆渡去萧山。晚上回家往往天都黑了。有时候天气不好,刮风下雨,钱塘江摆渡很不安全。我们全家担惊受怕。一直到1937年钱塘江大桥建成,过江才变得安全。但那时我们家已经离开杭州去了长沙。大桥建成不过3个月就因日军来到,主动炸毁了。我爸在杭州的几年中还去过一趟日本,购买日本的机车。照规矩买机车的人可以得一笔佣金。但是我爸把佣金全部购买了更多的配件。他回国时给我带来一些日本玩具,我还有点印象。

我妈虽然没有上过大学,但是她聪明好学,中英文都很好。她在家里排行最小,下面还有一个妹妹,是外祖父的偏房所生。我父母都是有知识的人,可是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读书。那时候认为子女的教育完全是学校的事,父母是不操心的。这和现在的想法非常不同。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我爸带我坐长江船,在船上教我写阿拉伯数字,要写得端正漂亮,我至今受益。我家一共给我请过两次家庭教师,每次都不过一两个月。我记得第二个老师姓潘,他教我读《古文观止》,读的是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和《秋声赋》。但是我更喜欢韩愈的文章,他的文章富有逻辑性。可是韩愈也不是逻辑完全严密的,我对他的



茅子轼

无悔的历程

关于千里马的文章提出了质疑。他认为只要有了伯乐,找千里马的问题就解决了,但是他没有说到哪儿去找伯乐。他不过是把找千里马的难题偷换成了找伯乐的问题。而且我又从中推出更一般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。

从杭州出来我爸爸先带我去衡,我在那儿的小学上学。爸爸在粤汉铁路机务处工作。因为他刚正不阿,得罪了官商勾结的一帮人。这帮人利用黑社会雇了流氓打手殴打我爸。显然我在那儿很不安全。于是他把我带去苏州、南京等地上学。到1936年爸爸在长沙有了稳定的工作,我们全家才搬去长沙。我的祖母跟我们住在一起。她督促我练大字。那时候是我们家生活最好的时候,家里有两个保姆。但是好景不长,1937年抗战开始,我家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,直到抗战胜利。

我的头一个学校是杭州狮虎桥小学。那时候我只有5岁多,不会上厕所,要隔壁的姐姐照顾。别的事都不记得了,只记得有一次我犯了错误被校长叫上讲台受训。我不服气,用小脚踩校长的鞋子以解气。校长倒也没有认真,哈哈一笑了之。后来父亲的工作调动,我就去了苏州、南京、衡阳等地上学。后来由于抗战,我们跟随父亲的工作辗转大后方,从长沙到桂林,到上海,又回柳州,在桂林、全州等地上学,后来到了重庆,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,是1946级的校友。总体来看这12年的中小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,其中小学6个,中学7个。

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,都是勉强及格,但是我对课外读物有兴趣。在小学四年级时就看科学杂志,因为好奇心,记得最早看的是关于性方面的文章。初中我上的是桂林汉民中学。家是在柳州,要坐一夜的火车去上学,除了暑假寒假平时不能回家。那时候我11岁就离家住校。记得离家上火车时非常依依不舍,到了学校天天想家。我妈也非常不舍得,写信给我,说梦见我晚上睡觉没盖好被子。我接到这封信,恨不得马上投入妈妈的怀抱里。11岁的孩子确不会生活,不知道洗澡,不知道换衣服,几个月下来身上长了虱子,我还以为是树上掉下来的虫子。最可怕的是我不懂得下水的危险性。有一次差一点盲目下水,如果下水,很可能会溺水身亡。那时候我们同班一个女同学就是溺水死的。学校组织人打捞尸首,晚上点了汽油灯通宵寻找。

中学一年级的時候我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,和几个同学谈天文学的问题,这几位同学都是科学家的孩子。我上的这些学校都算不错,老师都还可以。但是因为频繁转学,学习很受影响。我开始对学习感兴趣是在中学三四年级。但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是在南开中学的最后一年。首先是数学老师特

别好,他叫伉铁建,大家叫他伉老二。他教解析几何条理非常清楚。上课听讲,下课做作业,就完全明白了。考试就不害怕了。在南开我喜欢了音乐、体育,培养了我一生的好习惯。

我受的家庭教育有没有使我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?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。最近我得出结论,确实有所不同。有两件事可以说明: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。大部分人都站着,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,而我却等不及,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。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,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。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。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,在传送道上往前走,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(有别人挡道)就停下来了,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。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,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。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,只要看一点,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。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,学历是高是低,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。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,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。

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。比如,我们3点45分就上了飞机,要飞3个小时。可是起飞不久,4点多钟就开饭,乘务员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。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。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。而我要再等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。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。

我的这些不同,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。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我从小就有,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。1950年我们刚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时,每天下班后要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。那纯粹是浪费时间。我最不愿意政治学习。每到下了班开始政治学习时,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“学习”,而我则拂袖而去。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。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,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。不怕与众不同,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特点,既因此而吃了很大的亏,也因此有巨大的得益。我认识几位大学教授,他们的水平都比我高,但是怕与众不同,学术上没有太大的成就,非常可惜。



茅子
轼

无悔的
历程

第二章 成 长

抗战中的磨难

在我开始记事之前，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。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，一个月拿近500块钱。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，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。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。我记得大约在1938年，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作伤兵病院。这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。我们小学生去慰问，送面包给他们吃。有些轻伤的伤兵好一点之后就自由上街。他们有时候闹事、打人。他们的心情很不好，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，担忧今后的生活怎么办。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。

楚怡小学当时在长沙是相当有名气的，教学质量很高，有一个大操场，还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。朱镕基也在那儿上过学，而且他和我同年，我俩很可能是同班同学。我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姓陈，他借过我家的照相机回乡间老家去照相。湖南人语文水平高，字写得漂亮。那时候也正是我祖母教我写字的时候。前几年我再去访问楚怡小学，已经今非昔比，显得相当败落。看样子马上就要关门。我在杭州的时候讲杭州话，在长沙的时候讲湖南话，后来去了广西，就讲广西话，去了重庆就讲重庆话。小时候学说话的能力极强。成年以后就不行了。我在北京住了半个多世纪，北京话中始终带有南方口音。

抗战以后，物价开始上涨。我们家从长沙搬到桂林时，记得父亲在亨达利钟表店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一只欧米茄手表，店家附带赠送一个小座钟。可见那只表的价值不菲。那只表后来戴在我的手上。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一直戴着它。虽然修理过许多次，还走得很准。我在佳木斯开火车时还用着，一直用到结婚后，买了一只日本表，性能比它好，就不再用了。这只表最后在改革

开放之后以15块钱卖给了收旧货的。当时觉得卖了一个好价钱。后来知道卖得太便宜了。半个世纪以前的名表是可以当古董卖的。

等到我上中学的时候,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。父亲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。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,负担是很重的。抗战时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。学校里的伙食非常差,经常吃不饱。每桌上的饭是定量的。吃得慢,别人抢先把饭吃完了,自己只好饿肚皮。至于吃肉,那是一件极奢侈的享受。我经常走过校门口看见小摊上挂的油光锃亮的猪蹄子,馋得淌口水。在桂林汉民中学时,同班同学(忘记了名字)每星期日带我回他的家,(我家在柳州)他母亲总是炒两只菜,一只炒肉丝,一只炒鸡蛋,供我们两个大吃一顿。他母亲爱自己的孩子,也爱别人的孩子,让我跟着吃。印象深刻,至今不忘。

八年抗战,吃一直是大问题,挨饿、嘴馋始终跟着我。附带说一句,抗战虽然十分艰苦,但是没有大规模饿死人,个别人饿死肯定是有的,也只不过几万,顶多十几万,绝不会有几百万、上千万。这说明,即使在战争的条件下饿死人也并不普遍。

从1941年到1946年的6年中学时代,我是在抗战时期度过的。抗战的大背景,决定了生活的动荡不安。我6年的中学时期换了7所学校。其中1944年日寇进逼桂林、柳州,直迫贵阳,我们从桂林逃到贵阳是最大的一次转移。那时我正在桂林智德中学读高中一年级。因为风声日紧,我随着父母弟妹撤退到了贵阳。这是一次艰难的历程,也是让我这个15岁的孩子迅速长大的过程,它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,日本侵略军不但吞并了半个中国,而且出兵东南亚诸国,兵力分散,力不从心。但为了打通华中通往越南的通道,日本又出兵10余万人攻打衡阳、桂林、柳州、南宁。国民党有数倍于日寇的兵力,但政治的腐败使得军队缺乏战斗力。除方先觉将军固守衡阳47天之外,没有形成抵抗力量。日军长驱直入,占领了桂林、柳州之后,于1944年冬,日本仅用了3000骑兵,驱赶几十万中国军民沿着黔贵线撤退,造成了抗战史上最可耻的一页。从柳州到贵阳的黔贵线当时只修了全线的1/4,火车只通过金城江。从衡阳、桂林、柳州撤退下来的大批机车车辆及疏散物资,一齐拥到了百余公里的铁路线尽头。一切可以停放车辆的转道上都停满了车辆,车站上堆满了物资,但前线撤退的车辆仍源源不断地来到。不得已只好修了一些通向山崖河谷的专用线,将车辆连同物资推到山谷和河沟里去。这些物资都是被认为



最有保留价值的，所以才历尽辛苦把它们运出来。早知这样的下场，当初何必费劲。

火车按理说比汽车的运输能力大得多。可是由于线路的建筑标准低，坡度很陡；机车用的煤质量太次，烧不上汽油；机车车辆维修状态很差，这种种原因使火车的运输能力锐减。后来火车也走不动了，许多人改坐汽车。可是大部分车辆都是老旧破车，零配件供应不足，状态极糟，再加汽油供应异常紧张。到最后大部分人只好扶老携幼，徒步撤退，其狼狈和困难是难以想象的。日本军队于11月占领了桂林和柳州。我方几十万军民沿公路撤退。本来广西、贵州很少下雪，那一年天公不作美，忽然下起雪来，难民饥寒交迫，疾病加疲劳，死伤无数。

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，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，而是乘人之危，彼此算计。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，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，就被人偷走。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，离开公路，走小路上山寨躲避，被当地百姓收留。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，非要逼她成亲，否则几十口人性命难保，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。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。后有敌军追赶，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，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，从柳州到贵阳几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，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。

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，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，既无重型作战装备，甚至缺乏粮草辎重。日本人跺一下脚就能把中国人吓得栽一个跟斗，而且让中国人自相残杀。为什么？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“一盘散沙”。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，解放战争中唱的一首歌《团结就是力量》确实是不错的。

然而，团结的背后是什么？是一种自觉的精神支持和道德约束，还是出于对权威的屈从，两者本质是不同的。同样是抗战中的故事，在平型关大捷中，日军伤亡惨重。我方战士出于人道考虑，将一受伤日军背下火线医治，不料被日本兵咬下耳朵。日本兵的这种至死不屈的精神很典型地说明了，何以日本军队能够打胜仗。中日两国精神的对比反差太大了。日本人的这种精神也可解释何以他们能制造出质量最好的汽车、音响、摄像机，但是日本兵咬八路军耳朵的事，也说明了日本人把优良的精神用错了地方。这也是时至今日，东南亚诸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仍不放心的原因。

我们沿黔贵线撤退时，我的一班高年级同学曾自己组织起来，上山去打

游击。其实,既没有枪支弹药,又没有作战知识,怎么打得了仗?后来国民党到贵州地区征召青年入伍,他们就应召,受训后去缅甸与日军作战,成为青年远征军的一部分。这个班在我的许多同学中是境遇最惨的一班。除了少数几人跟着国民党撤退去了台湾,大多数留在国内。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因为参加过国民党部队,成为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。好几个人被整得家破人亡,妻离子散。现在他们写回忆文章时,认为当年应征参军抗日,是一生所作决定中最大的错误。做一个中国人多么可怜啊!黔贵线撤退,对日作战,政治运动,都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才遭遇的。

人类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,变得略为聪明一点了,人权的思想在全世界得到公认。过去侵占别人的土地现在要让出来,抢了别人的珍贵文物现在要归还;奴役了别国的百姓,强迫别人当慰安妇,现在要赔偿。以后谁再要用强权去侵犯别人,将被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群起而攻之。这可以说是一点进步,但是世界能否保持和平,这还难说。争夺财富和资源的战争可能性似乎变小了,但当今因为民族、宗教、历史冤仇的战乱丝毫不见少。

中国的百姓有没有进步?再碰到战争、天灾人祸、金融危机、政治运动这些意外,我们能否处乱不惊,团结起来战胜困难?杀人越货,借钱不还。假冒伪劣这种种坏事是少数人做的,大多数人还是好人。但是在红灯面前抢行,随地扔脏东西,排队加塞却是经常能见到的。事情虽小,但到了紧要关头,这一部分人就可以坏大事情。我已经老了,来日无多,恐怕还能在平安中度过余生。我的身后将如何,仍是一个大问号。其实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希望青年人能从我的经历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,为自己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。

直到抗战胜利,学校的伙食忽然大大地改进。那时候我在重庆南开中学。每顿饭都有荤菜。最经常吃的是地瓜炖肉。同时美军的剩余物资在市面上出卖,有奶油、冰激凌粉、蛋粉等,价钱便宜,营养丰富。可是和平的好景不长,一年后国共内战开始,生活又走下坡。那时我已经进入上海交大,食堂的伙食很糟糕,幸亏美军的剩余物资供应充足。大学生经常吃美军的ration(配额给养),一个涂蜡包装的纸盒子,重量不过一磅多,但是营养足够一个成人所需。里面有几片饼干,一个肉罐头,一块巧克力,几支香烟和一卷手纸。盒子的内容物不是千篇一律,每次打开,像挖宝藏似的,想发现一些新东西。美军的剩余物资除了吃的,还有穿的用的,有雨衣、皮鞋、军服、军毯、睡袋、信纸、信封等,给当时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,缓解了物资供应紧张的压力。对比之下,大家也对美国生产力之强大有了切身的感受。那时候上大